

古代的江淮地区 经济开发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中国唐史学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

卢华语 庞 举 龙 华 主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

卢华语等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市计委机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17千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621—0346—1/G·205

定价：2.7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古代区域经济研究的专辑，与《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一书是姊妹篇。作者大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教授、专家，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公元3—9世纪长江上游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速度、水平、历史地位和作用、发展原因、特点和规律以及现实开发的战略决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在方法上，除一般定性描述外，也注重比较研究，动态研究及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等，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供大专院校历史专业师生，地方史、经济史研究人员及从事现实经济研究工作者参考。

目 录

- 序..... (何汝泉) (1)
- 略述公元六世纪前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许 辉) (3)
- 魏晋南北朝益、梁地区经济略论.....(刘静夫 刘伟航) (18)
- 唐代前期关中与蜀中经济的比较研究
——兼谈两个“天府”的兴衰..... (赵文润) (38)
- 从五种经济植物分布变迁看两千年来西南地区生态变迁及对经济的影响.....(蓝 勇) (59)
- 关于古代天府经济的几个问题.....(王炎平) (74)
- 秦汉到隋唐四川盆地经济区的能量与信息交换.....(谢元鲁) (91)
- 汉魏时期四川盆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初探
——兼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彭 年 陈 巧) (112)
- 唐代“三川”社会经济初探.....(翁俊雄) (124)

论唐代四川经济	(卢华语 劳允兴)	(143)
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		
展的若干问题	(陈衍德 郑学檬)	(158)
川东地区六朝隋唐间的经济		
发展述略	(张泽咸)	(179)
唐代东川节度使的设置及		
其辖区经济的增长	(田泽滨 杨宗兴)	(187)
公元3——9世纪岷江上游地		
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	(周伟洲)	(201)
魏晋南北朝时代巴蜀地区工商经济		
的持续发展	(马志冰)	(217)
唐代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的水		
利开发		
——兼论汉唐四川地位变化的原因	(何汝泉)	(231)
唐代巴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何荣昌)	(250)
魏晋时期滇蜀交通与云南经济的发展	(罗秉英)	(264)
艰难的开发		
——汉晋至隋唐时期贵州社会		
经济发展概述	(张祥光)	(283)
3——9世纪乌江中、下游		
(贵州段)地区的开发初探	(王新邦)	(292)
附录:		
公元3——9世纪长江上游社会经济		
学术讨论会纪要	(卢华语 蓝勇)	(305)
后 记		(315)

序

四个现代化催促长江流域的开发，而思考开发长江流域的人们，需要考察其历史和现状，这就给历史学派上了用场。于是，中游一马当先，1986年召开了“三——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下游积极响应，次年便在常州集会讨论；不甘落后的上游，也如期开了相同的讨论会。

这次长江上游社会经济讨论会，着重探讨了三至九世纪今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探讨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和秦陇中原地区的关系，总结了一些古代长江上游社会经济开发的经验教训。象这样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长江上游的开发问题，至今还是第一次。和中、下游会一样，这次也从三十多篇论文中选出十九篇，汇成这个《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论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把会议成果贡献给社会，贡献给正在开发长江上游的规划者和实践者，贡献给一切有兴趣于长江上游开发事业的人们。

当然，举行几次讨论会，出版几本论集，尤其是只就三至九世纪这个时段展开讨论，不能认为就完成了长江开发历史考察的任务，但是，可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展示了史学家们为四化闻风而动、各尽所能的可贵精神。

近年来，史学备受急功近利思潮的责难，古代史学首当

其冲。一些人总是抱怨古代史学没有为现代化服务，可是，当许多为现代化服务的事物出现时，他们却不予理睬，或者托辞爱莫能助，甚至投以鄙弃的眼光。古代史学受到冷遇是不公平的；急功近利不仅危害四化建设，也桎梏史学的发展；历史呼唤高瞻远瞩的伟人，历史也必将孕育出这样的伟人。

这次“三——九世纪长江上游社会经济讨论会”，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重庆召开，有西南九所高等院校联合主办，得到重庆市委、市府的支持。这个论集的出版，要是没有市计委负责同志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无论如何是不能实现的。这些事实，无疑会使大家得到宽慰和鼓舞。

这次会上，一致提议召开一次全方位的长江流域开发史的研讨会，并呼请有关方面大力支持。召开这个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困难委实不小，特别是经费问题。然而，我们从上游讨论会及其论集出版的事实感觉到，当今中国还是不乏有识之士，急功近利的人毕竟很少，所以，这个会有可能开成。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即将付梓，我们不揣谫陋，唠叨一通，聊以当《序》罢了。

何汝泉1989年3月

略述公元六世纪前 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许辉

长江上游地区，《禹贡》称其地为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秦平天下，置为汉中、巴、蜀，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魏末，分置梁、益二州，晋初因之，后又分益州南境置宁州。唐时为山南西道，山南东道，剑南道、黔中道以及包括陇右道和京畿的部分地区。北宋为益州、利州、梓州、夔州四路⁽¹⁾。大体上包括今四川全境、云南大部和贵州部分地区。公元六世纪前，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奠定了唐代益州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们对这一时期经济开发和状况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貌，而且由中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四化建设，加速整个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

长江上游的开发，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定居在巴蜀地区的古人类就与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并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先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

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颡颥〕；封其友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²）。巴人的居位区域大致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他们的祖先为廆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世本》曰：“廆君之先，故出巫诞”。刘琳认为巴族似为苗瑶系（³）。而蜀人亦是一古老的部族，他们虽然自古即与内地的华夏族有联系，但是他们的语言、风俗等与内地华夏族不同。《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⁴）。古蜀国在杜宇为蜀王时，已“教民务农”，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⁵）。说明早在李冰父子前，古蜀国人民为发展农业生产，已开始开凿灌县宝瓶口，分岷江水为沱水，用于灌溉。秦惠王时，蜀侯派使者朝于秦。时惠王方欲谋伐楚，秦将司马错、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⁶）。惠王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惠文王利用蜀国内部兄弟不和（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其弟奔巴，巴蜀为仇的有利时机，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伐蜀，蜀平，司马错等又取苴与巴，“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⁷）。

不仅文献记载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近年来

通过对成都十二桥古蜀文化遗址的发掘，连同广汉月亮湾遗址、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市区方池街遗址，专家们提出这里存在着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的自成体系的古文化，即蜀文化的观点。这种古蜀文化虽然某些方面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整体上看，它属于一种与中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⁸⁾。考古发掘材料和文献记载是互为印证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长江上游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一) 秦汉时期

秦汉是大一统时期，中央封建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主要表现为：首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其中最著名的乃是秦昭襄王时蜀郡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⁹⁾。此外，李冰“〔通笮道文井江〕，经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灌溉稻田，膏润稼穡。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¹⁰⁾。西汉景帝时，庐江文翁为蜀郡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¹¹⁾。西汉末，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¹²⁾。国家对水利事业的兴修，为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汉时绵，雒膏腴之田水稻能亩收三十斛至五十斛，相当于今亩产780斤——1160斤⁽¹³⁾。这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发展交通，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战国楚威王时，楚将庄蹻溯沅江西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地，至云南滇池，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庄蹻便变服王滇。后来秦的势力达西南夷中，为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秦常頌“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史焉”⁽¹⁴⁾，即在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道一带开通宽五尺的道路，并在附近各地设置官员。又“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¹⁵⁾。西汉建元末年，番禺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得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通达南越，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将，浮船牂柯江以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兵千人，从巴蜀笮关入见夜郎侯，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又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¹⁶⁾。汉武帝又根据张骞在中亚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来自身毒（印度），得知巴蜀与身毒可通，便于元狩元年（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往西域。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武帝最终未能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但是汉与西南夷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之间的道路和联系确是打通和加强了，“当是时，巴蜀四郡（即汉中、巴郡、广汉、蜀）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饷”⁽¹⁷⁾。

道路的打通，交通的改善，促进了西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秦并巴蜀后，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今郫县城北）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今邛崃县城）周四六里，高五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¹⁸⁾，即按秦都咸阳的规制、店肆居室分布来规划成都城。

秦、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大商人均以经营盐铁致富。巴寡妇清，以经营朱砂而致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¹⁹⁾，秦始皇为其在家乡涪州筑女怀清台。蜀卓王孙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²⁰⁾。这些富商大贾利用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池山泽之禁”的有利时机，“周流天下”，从事频繁的商业活动。正如《蜀都赋》所说：“贾贸埽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憧华，面有栳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²¹⁾。巴蜀地区商人的活跃，由此可见一斑。

开疆拓土，在少数族聚居地设置郡县。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叛，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笮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駹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击滇，滇王降，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²²⁾。

东汉时期，西南地区除夜郎、滇、巂、昆明、徙、邛都、笮都冉駹等族以外，还有哀牢及其他许多部族和民族归附汉朝。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贤栗率部分种人内附。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种人邑王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内属，东汉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属六县（《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巂唐、比苏、牂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此后东汉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

掸族发生了经济，文化的联系。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菽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族内附，白狼王作诗《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章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²³⁾。

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在那里设置郡县，对该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的进步，是意义重大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个分裂和南北对峙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长江上游经济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公元221年刘备在这里建立的蜀汉政权在发展经济上具有如下特点：（1）推行“务农殖谷”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治理蜀汉，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他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政权，就是要“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²⁴⁾。因此，他一方面利用制定的蜀科等法律适当的约束豪强地主任意兼并土地和侵夺人民财产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便大力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体息的政策。蜀汉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有大司农、督农管理全国和郡县农业生产⁽²⁵⁾，设屯骑校尉专管兵士屯田⁽²⁶⁾。对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十分重视。政府设有“堰官”，专门调拨一千二百名兵士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保护和疏浚。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出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左思《蜀都赋》描绘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²⁷⁾。

（2）着意开发当地资源，促使蜀国经济全面繁荣。巴蜀地区富有盐铁等矿产资源，蜀汉在发展经济中充分利用并发挥了这个优势。刘备平定益州后，就恢复了西汉武帝时实行的盐铁

官营政策，设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²⁸⁾，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²⁹⁾。蜀汉的制盐业十分繁荣，《蜀都赋》形容说：“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火井即盐井，刘逵引李善注曰：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³⁰⁾。盐铁事业的发展，使蜀国“利入甚多、有裨国用”⁽³¹⁾。政府还设有“锦官”，专管蜀锦的生产。《蜀都赋》描绘成都织锦业发达云：“阡阡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³²⁾。大批精美的蜀锦，成为蜀汉向魏、吴销售的主要手工业品，“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³³⁾。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经济收入。后来蜀国灭亡，府库中还存有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³⁴⁾，可见蜀锦的产量是很惊人的。业，手工业的发展使蜀国经济出现了“田畴辟、仓廩实、器农械利、蓄积饶”⁽³⁵⁾的全面繁荣局面。长江上游地区，汉武帝之前统巴、蜀、汉中、广汉、犍为五郡。汉武帝开西南夷后经东汉至蜀汉，随着这一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由蜀郡中分出越嶲、汶山、汉嘉三郡；巴郡中分出巴东、巴西、涪陵、宕渠四郡；广汉郡中分出武都、阴平、梓潼三郡；汉中郡中分出魏兴、上庸、新城三郡；犍为郡中分出江阳、朱提、南广三郡。其中巴郡之分为“三巴”，在刘璋统治的建安六年；涪陵郡之立，在刘禅延熙十一年(248年)之后；宕渠郡之立，在刘先主章武二年(222年)六月前；汉中郡分立的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均在建安二十年；犍为郡中分江阳郡在建安十八年。上述二十一郡，加上蜀汉所开的南中五郡(诸葛亮平南中后，改益州为建宁、分建宁、越嶲置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共二十六郡，其中不少郡县的增设是在东汉末至蜀汉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蜀汉

对长江上游的开发和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3)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特别是南中,更是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徯、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徯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徒、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6)。汉武帝开西南以来,虽然在这里设置了郡,把这一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但是这里的经济开发,还处于很落后的闭塞状态,少数族也不时进行骚扰和斗争。刘备入蜀后,根据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37)的策略,注意和西南夷搞好关系,置庾降都督总摄南中,并用西南夷的一些夷汉豪强作本地的守令丞史。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蜀国出现混乱,南中益州郡豪强雍闿、牂柯太守朱褒,越徯夷王高定元等趁机起兵反蜀。建兴之年秋,诸葛亮率师平定了南中豪强和少数族上层分子发动的叛乱。为了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诸葛亮任李恢为建宁太守,马忠为牂柯太守;把夷人渠帅徙置成都为官;把南中劲卒青羌编为军队,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并把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教少数族使用牛耕,改变那里落后的耕作方法和生活方式;由国家管理那里的盐铁生产;派人教授织锦方法、传播手工业技术。使少数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38),南中地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而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

源，“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³⁹⁾，有力地支持了蜀汉政权及其北伐活动。

由上述可见，虽然这时处于分裂、割据时期，但从蜀国经济的发展与秦汉相比较，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的，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应该说都向前发展了。

再看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李雄于永兴元年（304年）称成都王、旋称帝，至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死，在位三十年。史称“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⁴⁰⁾，根据《晋书·食货志》和《初学记》引《晋故事》，西晋民丁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户调绢三匹，绵三斤。则成汉政权民丁的田租和户调均较西晋为轻。剥削的相对减轻，造成了“夷夏安之”，“年丰谷登”⁽⁴¹⁾的安定局面，蜀地的经济在继续发展着。

蜀汉和成汉政权期间，长江上游经济得到发展的事实，说明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偏安一方的统治，经常能够实施一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使分裂割据时期的地方经济仍然得以迅速发展。

二

从六世纪前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已开始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民族分布、自然地